

福利政策改革的新曙光？ 社會投資理念與實踐評述

吳明儒

壹、福利國家改革之新曙光—— 社會投資型國家

二次戰後傳統福利國家的理論，相信建立「凱因斯需求導向的福利國家」（the post-war demand-oriented Keynesian welfare state），透過市場面的自由主義，能夠創造需求市場，帶來工作機會，進而帶動經濟發展，此一福利國家發展的論點在1980及1990年代是此一新自由主義市場導向福利典範（the dominant neoliberal market-oriented welfare paradigm）發展的高峰，凱恩斯理論建立在男性養家模式，採取直接的轉移支付，屬於被動社會政策，著重短期效果而無法面對未來的變動。但是隨著全球化發展，亞洲金融風暴，衍生出青年失業，社會不均擴大、人口老年化加劇、出生率過低，勞動市場供給不足，經濟波動所產生財政

緊縮等問題，舊的福利國家理論已經無法面對新風險，引領未來社會政策的發展趨勢，社會投資理論就在這樣的背景中提出，福利制度必須將過去修補（repair）轉變成為準備（prepare）的福利制度，消費性轉成生產性的福利制度，強調投入人力資本投資，形成積極勞動市場（ALM）的推進力。因此學者提出社會投資型福利國家（social investment welfare state）是一種新興積極社會政策典範，廣泛受到歐盟、北美及東亞國家的重視（Morel, N., B. Palier, & J. Palme, 2015）。

著名的社會福利政策學者Esping-Andersen, G.等（2002）早就提出新福利國家（new Welfare State）的願景，針對五項智識創新提出未來社會政策的方向必須改變：（1）社會風險的本質已經改變，高齡依賴人口的增加、中高齡低技術

的失業者增加、社會安全覆蓋不足、違反勞動條件的就業加多、快速技術升級所造成的人力資本耗損、學校退學率提高、家庭功能缺失、單親家庭增加、工作一照顧一家庭無法協調（特別是工作母親）等新社會風險（new social risk）的出現；

（2）福利國家的「承載能力」（carrying capacity）評估，顯示非典型勞動使薪資勞工無法完全轉變成為納稅的公民，福利國家無法完全覆蓋福利需求者；（3）從動態生命歷程觀點（dynamic life-course perspective）評量福利提供的方式勢在必行，生命歷程中有四個階段是最脆弱的階段：離開教育進入第一份工作、有小孩、經歷經濟蕭條勞動市場、面臨退休；（4）家庭內人口組成及性別角色逐漸改變，女性知識解放及終身生涯而渴望有「新性別契約」（new gender contract）；這個契約面臨兩個挑戰：親職與職涯工作的競爭、男性與女性生活存在於更平等的兩端；（5）提出「充權性」社會正義（‘capacitating’ social justice）的規範性概念。

分辨一個福利國家是否為社會投資型及其成分有多少，可依據這個國家的福利支出是以投資型還是補償型的政策為主（Morel et al., 2015）。其中，補償型主要是供給福利服務、保證生活水準連續性、減少收入不平等；而投資型的政策則在於滿足未來和年輕一代的需求，確保人

口再生產、兒童發展等。雖然歐盟各國的公共支出占各國GDP的比重有所增加，但是社會投資類型政策比重並未普遍增加（Hudson & Kühner, 2009）。些國家實施的投資計畫僅限於人力資本，沒有維持適當的補償政策。過去25年來，與老年人相關的支出增加而教育減少。南歐國家（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和東歐國家尚未真正進入社會投資時代。歐洲大陸國家，因為社會保險制度在社會支出上比重較高，因此屬於補償型福利。北歐則是兩者都重視的國家。

若將社會支出的屬性區分為福利國家型的「補償性支出」與「社會投資性支出」兩種，大致上可以分成四種類型：北歐將傳統社會保護與社會投資相結合，而盎格魯撒克遜則傾向於用人力資本投資取代補償性投資。差異的根源在於：對保護人力資本、積極與消極激勵、平等、權利等認識不同（李秉勤，2019）。北歐國家在不增加工作貧困的情況下提高就業率，加強了社會投資及社會保障，強調了社會平等和性別平等。社會投資被視為避免未來補償的方式。瑞典等北歐國家及法國注重兒童保育和其他家庭政策，成功緩和人口問題的衝擊。在這些國家，社會投資政策、人力資本和高品質就業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關。社會投資（支出模式）的四個世界，可以用圖1加以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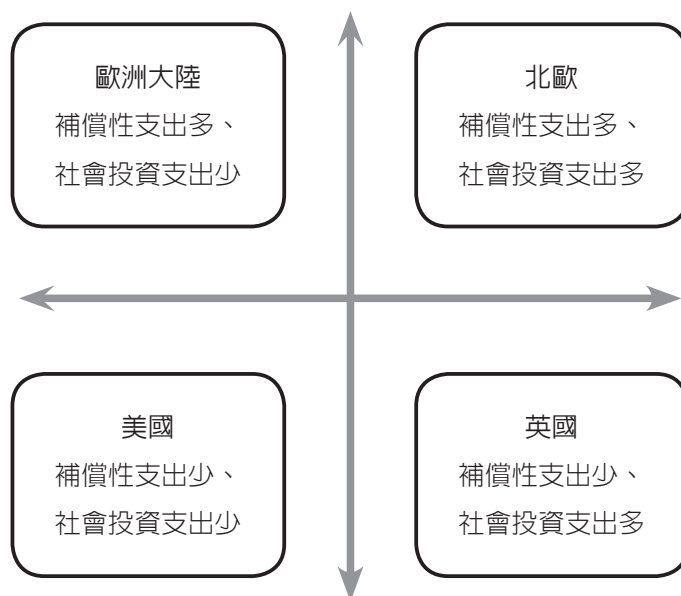


圖 1 社會投資型國家的四種類型

資料來源：李秉勤（2019）。

貳、社會投資政策實踐與成效

2013年歐盟委員會提出社會投資計畫（SIP, Social Investment Package）聚焦在福利改革在社會投資政策是建立在「準備」（prepare）面對未來競爭型知識經濟下新風險的基礎上，透過人力資本、生命歷程中從兒童到老年能力（capability）的建構，而不是經濟或個人危機來臨時，才提供補救、修復（repair）的政策，社會投資在歐洲發展有年，早在1997年歐盟就提出「社會政策也是一種生產性因素」（social policy as a productive factor）的概念，並且在2000年制定「里斯本議

程」（Lisbon Agenda）試圖使歐盟達到「2010年時成為最具競爭力和最具活力的知識型經濟體，能夠實現可持續的經濟成長，擁有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和更大的社會凝聚力（most competitive and dynamic knowledge based economy in the world, capable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and more and better jobs and greater social cohesion）。其內容包括2003年對研發進行必要投資、減少官僚繁文縟節以促進創業、就業率；2003-2005年對網路和知識的投資。但是，各國執行的力度不夠，效果遠不如預期（李秉勤，2019）。

2013年，歐盟在社會投資政策上開

始有所轉變，特別是對「積極的社會投資政策投入」超過「消極的社會保險支出」，女性主義者亦質疑社會投資政策最終促進女性投入勞動市場及鼓勵雙薪家庭，過度強調性別平等的規範性目的，反而形成女性經濟化（economization），再商品化的疑慮。而最尖銳的批判更直指社會投資政策所產生的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在比率上受益者有利於中產階級，下層階級者反而失去原有的，落入一無所有的窘境。「已經有的要加多給你，沒有的還要從你身上拿走」效應在財政緊縮的情境下，自由裁量式（discretionary）的社會投資政策，悲觀主義者認為不能恣意妄為，造成不可收拾的後果（Hemerijck, A., 2017）。

2008年經濟危機以後，福利國家陷入債務危機。2013年2月，歐盟委員會通過「社會投資計畫」（SIP），強調福利政策必須發揮三種功能：社會投資、社會保護和經濟穩定。其基本假設為：社會和經濟政策相輔相成，社會政策投資必須成為未來經濟和就業增長的「前提條件」，透過提升當前和未來的能力「準備」（prepare）成為勞動力生力軍，使他們能夠面對新風險，而非事後「修復」（repair）。SIP提出的福利政策包括：鼓勵社會參與，面對新風險；培養更高素質和適應力的勞動力，將公共支出從被動轉移變為人力投資；啟動勞動力市

場，促進終身學習以及協調工作—家庭關係。後續重點則包括投資知識和創新、使勞動力市場現代化、應對能源和氣候變化等。

社會投資的制度架構必須建立在三個重要的功能上—存量、流動與緩衝，而此三種功能的設計形成許多種套餐式的政策組合，其所產生的綜合效果（synergy effect）可以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參見表1）。三者之間在生命歷程（life course）中政策之間發揮互賴與互補的效益：（1）提升人力資本與能力「存量」（stocks）的品質；（2）暢通當代勞動市場和性別生命歷程轉移過程中的「流動」（flows）；（3）維持強力的最低所得的普及性安全網，包括社會保障及經濟穩定的措施，做為面臨高齡社會來臨時折衝社會及個人風險的緩衝或安全閥（buffers）。從表1的各項內涵可以理解：（1）在生命歷程中，透過教育所培養的優質人力及以建立厚實的人力資本十分重要；（2）流動性是透過不同的社會組織之間（學校、家庭、勞動及市場）建立互相補位的關係，促進整體經濟體系的健全運作；（3）建立最後的社會安全網，以避免落入貧窮及應對新的社會風險。建立在活化經濟體系的社會投資似乎忽略對於建構關係網絡中所形成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似乎對於經濟發展也有助益（吳明儒，2019）。

表 1 生命歷程中不同時期的存量、流動與緩衝內涵

	「存量」 (stocks)	「流動」 (flows)	緩衝 (buffers)
幼兒	普及和優質的學前兒童教育照顧方案 (ECEC)、提升認知發展和社會整合；減少貧窮及代間移轉	優質的學前兒童教育照顧方案 (ECEC)，提高家長與老師之間的互動品質；家庭與學校產生互補性	穩定的家庭功能；低貧窮風險；適當的營養與發展
青少年	優質的小學及中學教育提升認知發展；早期發展導向技能成就	包容性教育；滿足預備學習之需求及早期介入產生更好的生涯發展	穩定的家庭功能；低貧窮風險；降低退學率；提供優質的早期發展方案
青年成人	優質的中學教育、職業教育與訓練；提升技能檢定；支持大學及技職院校等第三教育 (Tertiary education) 的高入學率	學徒制；優質的中學及第三教育、職業教育與訓練；暢通教育—勞動—市場之轉銜管道；不同級政府之間的流轉機制	實質的最低薪資；在職生的基本維生；促進勞動流動；促進生產性成長
壯年成人	強化訓練方案，增進並強化個人能力；合適的勞動—市場的安置；避免因閒置產生的技能落後與無法精進累積經驗	積極勞動市場政策 (ALMP) 提升重返職場的效率；失業津貼可縮短工作與技能的錯置；家庭政策能調和育兒與全時工作之間	最低薪資、失業津貼及薪資所得稅式給付 (EITC) 形成一道安全網；家庭津貼可依子女數調整鼓勵生育率
老年	強化訓練方案和終身學習課程；在年老前，取得技能及預備進入高齡行業及生活規劃	再訓練及發展高齡就業的行業，提高進入年齡及獲得優惠年金之設計	提供最低薪資、失業緩衝或提高終身年金 (sustainable pension) 之設計

資料來源：Hemerijck, A. (2017)。

參、社會投資與政策效益擴增器

相對於福利國家型 (welfare state) 國家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一股對於新自由主義的反動力量快速崛起，調和經濟發展與社會政策是否可能，在北歐社會民主主義 (Social Democracy) 見證下出現新的典範—社會投資型 (social investment) 國

家。對於社會投資的概念，可以分成消極預防與積極投入，對消極預防而言，如何防患於未然，治於未病，過去只能在貧困發生之時才有社會政策介入，現在更加重視生命歷程中所潛藏的各種高社會風險，如在畢業與就業、生育與照顧、老年與退休等經濟安全較為脆弱階段先提出因應的所得保障政策，避免陷入貧困陷阱。

對積極投入而言，傳統給付型的福利國家造成福利依賴、消極受助，無法提供足夠的勞動力導致政府稅收不足等問題，更造成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階級間內在矛盾日益深化。因此，社會福利政策必須轉變成為政府稅收增加的加速器，成為支撐勞動市場的助力，福利制度必須依循生命歷程不同階段，投資或奠基於人力資本的形成，帶動積極市場政策（ALMP, 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y）（參見圖2）。OECD在1997年所提出的學前兒童教育照顧（ECEC, Early Children Education and Care）計畫，以稅式優惠方式的薪資所得稅式給付（Earning Income Tax Credit）取代資產調查的方式提供兒童津貼，對於投

入職場的婦女或所得不足的家庭無法提供幼兒適足的照顧，則由國家來提供市場性購買服務的機制（林昭吟、劉宜君，2017），除了可藉由兒童的早期介入提升認知能力，更重要是希望完善的托育政策有助於排除婦女進入勞動市場的阻礙。

瑞典與英國是兩個具有代表性的社會投資國家，瑞典長期推動積極勞動市場政策、重視公民地位的社會安全制度，建構社區型、公私夥伴的福利服務體系，再加上北歐的高稅率體制，使北歐成為社會投資國家的典範。英國則是積極投入積極勞動市場政策，但是在補償性社會政策較低。特別針對解決歐盟普遍面對的失業問題採取青年轉銜的制度（黃志隆，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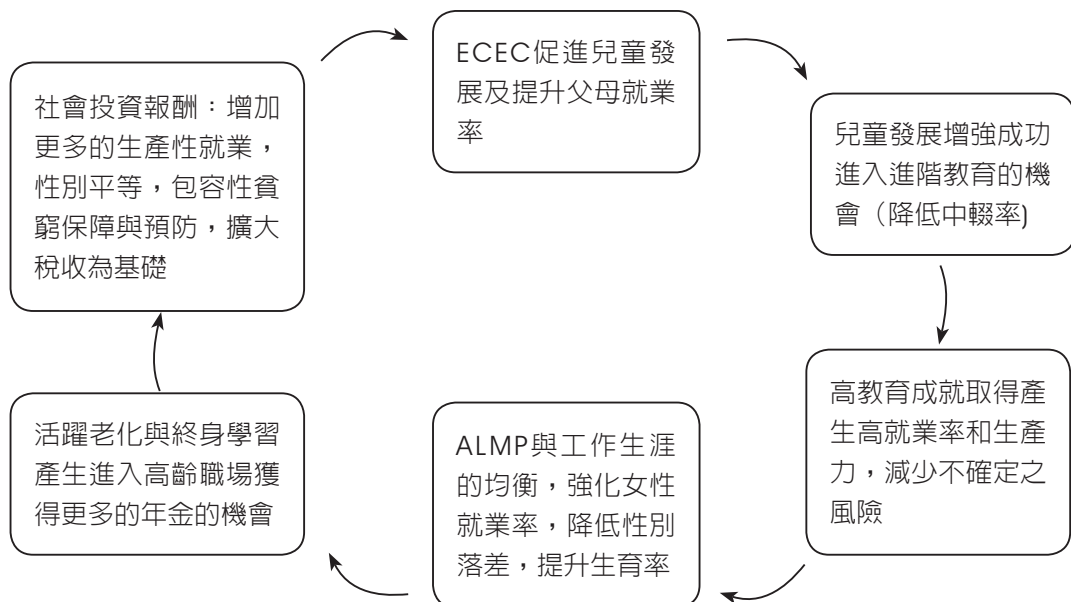


圖 2 社會投資在生命歷程中的效益擴增器（multiplier）

資料來源：Hemerijck, A. (2017)。

肆、重視社會關係累積的社會資本

伴隨著福利國家發展及學術界對於福利理論的爭論與探索，在社會變遷過程中新的福利思想逐漸湧現。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凱恩斯主義下的傳統的補償性福利國家，遭遇新自由主義的質疑與挑戰之後，出現了試圖扭轉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之間的對立局面的「第三條道路」，社會投資理論開始興起。在全球化的趨勢下，作為一種新的發展方向，社會投資型福利國家雖然已成為了世界先進福利國家福利改革的主流與新典範，但是對於傳統倫常關係、互助精神的嚮往及社群共用價值的重視，從福利國家走向福利社會的命題探討，不但成為了未來福利發展的另一個趨勢，同時也是重建社會秩序與福利政策的重要基礎。整體而言，社會投資（social investment）觀點重視對人力資本和經濟資本的投資，初期在教育與就業的社會政策受到重視，旨在增強人們當前和未來的能力，以便更好地開展社會經濟活動，以市場的手段促進生活品質的提升，但是近期逐漸重視第三部門、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及直接瞭解民眾的需求更甚於填寫申請表。1916年Lyda Hanifan首創「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中，更提出對於社會群體中人與人關係建立的重視（黃源協、劉素珍、莊俐昕、林

信廷，2010），包括諸如善意、交情、同情和社交往來等內涵，而這種資本經常被政策制定者所忽略。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後，隨著福利制度遭受質疑與福利國家謀求改革的過程，這一概念開始受到重視，甚至被西方國家視為解決社會矛盾的新思路。從西方學者對社會資本的不同詮釋中歸納出四項共通性（吳明儒，2019）：

1. 社會資本是一種鑲嵌在社會關係內的資源，具有協助網路內的成員完成某些行動的功能；
2. 社會資本具有協助網路內的成員完成某些行動的功能；
3. 社會資本涵蓋了道德、情感或是工具性成分；
4. 社會資本的概念不僅適用於社會或群體中個人的觀察，也能應用於社會或國家總體現象的解釋。

社會資本與社會投資理論將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結合起來，可謂異曲同工，最終目的都在激發社會活力、增強社會凝聚力，實現社會與經濟發展的雙贏。與社會投資理論相輔相成的是福利發展主義（welfare developmentalism）的興起。聯合國1969年在紐約召開國際社會福利部長會議開始對過於強調矯治的社會工作提出質疑，認為社會福利對國家也應該有所貢獻。緊接著行動主義興起，受「南方世界」婦女運動影響，公民參與及志願服務發展愈加蓬勃。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社

會發展或發展性社會工作概念逐漸成形，福利發展主義開始成為西方社會工作專業模式之外的另一種選擇。發展性社會工作強調公民權利、民主參與、集體改善、優勢賦權，以社會投資促進社會整合和發展（羅秀華，2011；郭登聰，2017）。因此發展性社會工作觀念的啟發，可以說是企圖擺脫早期西方工業國家為解決社會問題的社會病理的觀點，不再把福利的受益者當成案主，而是從生態體系觀點、將案主當成一個公民，一個福利的生產者。

順著這一理念的發展，同一時期所出現的共同生產理論（the theory of co-production）就自然孕育而生。同時，福利國家大量運用外包式契約，福利制度要求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在政府通過購買服務來提供公共服務的同時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由於政府並不是福利直接提供者，就存在公共服務的責任承擔與延續性問題；而且這種模式下往往只能看到服務接受者的問題，卻看不見其自身同樣具備一定的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Ostrom在1975年提出了公共服務「共同生產」的概念（Pestoff, V. et al., 2012）。這個概念意味著一些經常性所需的財貨與服務，可以通過不同組織的個人來提供，任何一種「產出」都是共同努力下的產出。這就帶來了公共服務觀念的改變，從「為社會大眾」（for the public）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到「由社會大眾」（by the public）來提

供的公共服務，服務消費者可以與提供者在服務過程中成為共同生產者，一起致力於公共利益的創造。

此一概念提供公民參與為福利服務發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公民參與福利服務的提供，能夠結合社區在地的資本，形成被服務者也是生產者的共同生產關係，例如長照C的據點的建立，社區網絡建構關鍵在於關係網絡而非專業程度（吳明儒、劉宏鈺、歐紫彤，2018）。通過賦予當事人權、社區培力、共同生產及核心經濟（core economic, 關注非經濟性的交換關係）的理念探討，建設使公民更加獨立、更有尊嚴的福利社會。牧野篤（2018）認為未來的社會強調人與人之間的禮物關係的善循環，顧客與企業單位公民與行政部門將完全轉型，過去生產與消費、提供與享受的「授與受」的關係將過去，施與受的兩端必須共同創造「微型社會」，產生互相承認、互相協助，不斷創造出新的社會價值。未來社會投資政策可朝建立活絡與友善的微型社會方向發展，將自下而上的社會正義和社會實踐工程，與自上而下的社會政策結合起來，共同構成社會福利工程，是順應社會變遷、利用科技創新和社會政策創新的社會創新之路。

伍、政策限制與未來可能

社會投資型國家的各種政策產出，

一改過去消費性社會支出，轉變成為生產性社會支出。讓社會政策融入並有助於經濟政策及勞動政策之中，抬升稅基進而增加福利國家財政的健全，也維持資本主義結構的合法性。然而，社會投資型政策的效應均非短期可見，例如投資教育、投資兒童，生命歷程及世代移轉的效果也都必須經過長期的投入才能在勞動市場之中反映出來。而政策的連續性不足往往削減的這些政策的延續效果，評估政策的成效也不易（林昭吟、劉宜君，2017），無法說服短視近利的政客，更無法動搖目前經濟體資源分配、生產與分配的控制結構。呂建德、葉崇揚（2017）指出臺灣在1980年代以後，在國際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下，一方面全球化形成傾向資本家的新政商聯盟，另方面在民主化政黨競爭下，國家必須追逐福利支出的寬鬆政策，以爭取選民

支持，延續執政的合法性，結果造成不利於中產階級的稅收政策，超高所得者成為最大的收益者。兩位作者認為跳脫此一結構矛盾的方式就是運用歐洲興起的社會投資概念，將社會政策從以往的消極性社會支出（社會保險）轉移為積極性社會支出（積極勞動政策、教育及家庭政策）。不過，積極性社會支出仍有賴充足的國家稅源與稅基的擴大，國家的經濟資源的分配控制似乎更影響社會投資政策的推動力度。

北歐國家能夠成為社會投資政策推動成功典範（李秉勤，2019），強調平等同富的社會資本主義（social capitalism）的經濟分配結構模式，恐怕是最關鍵的因素。從圖2顯示經濟權力來自對於各種資本的配置、組織及使用直接控制，在公民社會的次級團體可以透過各種機制，直接影響使用這類經濟權力的方式，例如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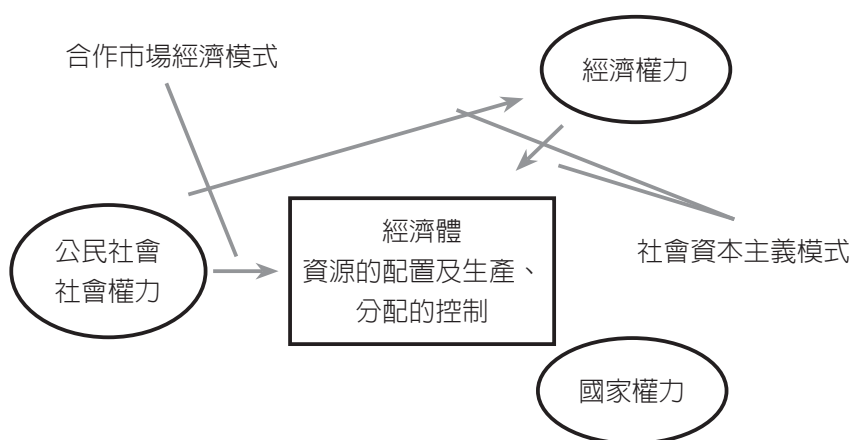


圖3 社會資本主義及合作市場經濟分配架構

資料來源：Wright著，黃克先譯（2015），頁192-194。

會經常可以控制大筆的退休基金，嚴格限制任何不是用於確保受益人退休金用途的基金運用，魁北克甚且創設由工人控制的創業投資基金（Wright著，黃克先譯，2015）。

其次，魁北克在托育服務及居家照護方面也以非營利及合作社性質進行服務的提供。例如幼兒托育每天只要7元加幣就能享有托育服務，加國政府並未直接提供，而是補助成立非營利托育中心由托育人員及父母志工共同經營，臺灣目前也有非營利幼兒園也朝此精神發展。在老人居家服務以一種「團結式合作社」（solidarity cooperative）的部門納入生產者（居服員）、非營利機構、服務使用者、社區組織、社區參與者幫助合作社在地扎根，以回應社區老人的需求（Wright著，黃克先譯，2015）。

社會經濟（social economy）是社會投資相當接近的理念。張英陣（2017）認為社會經濟是以社會經濟學為本的社會實踐。社會經濟希望在資本主義市場及福利國家弊端之間尋找另一條社會創新

（social innovation）的出路，其結構形式的表現以合作社、互助會社、社團和志願性組織為主。社會投資與社會企業、社區產業、社會經濟等理念均是殊途同歸（林昭吟、劉宜君，2017），希望在減少國家干預的情況下，提供非營利組織發展的友善環境與優惠政策，培養公民社會的公民行動力，例如可投入各項國家主導的照顧服務之中，避免政府科層的介入造成制度僵化，同時發揮公民互助共享的精神。表4說明在幼兒及老人等福利服務可以成為未來社會投資的重點領域之一，擴大利用社會經濟手段的社會投資政策將解決未來臺灣高齡少子社會的重點之一。

最後，2020年開春，新型冠狀肺炎快速蔓延，危及全球，美股2月27日再度出現恐慌賣壓，道瓊指數崩跌1190點，創下史上最大跌幅，速度之快為1929年經濟大蕭條以來之最（2020.2.28為止）。顯然，新型冠狀肺炎造成全球經濟的衝擊，生產線斷裂，旅遊禁令，工廠停工，成為最棘手的社會風險之一，社會政策實在無法預先防疫（沒有疫苗），但是如何避免讓病

表 4 四種提供幼兒及老人托顧的方式

		管理托顧的主要規範	
		權利	關懷照顧
提供托顧服務的主要動力	集體	政府提供的托兒（托老）	社會經濟托兒（托老）
	私人	資本主義市場托兒（托老）	家庭托兒（托老）

資料來源：修改自Wright著，黃克先譯（2015）。

毒從境外移入轉變成為更麻煩的社區感染，除了醫師與公共衛生專家的努力十分重要，但是公民配合檢疫隔離、社區組織的防疫及社區自主健康管理的能力也至為關鍵，發放檢疫隔離者及請假照顧家屬的補償金是事後弭補的消極社會政策，那麼強化人與人的信任關係及建立社區防疫能力應該是一種積極社會政策的表現，鑲嵌在社會關係中社會資本，在關鍵時刻，社

會資本能夠形成信任社會，真正的信任社會有助於社會團結，成為包容社會，因此公民社會的自主、積極，及累積正向的社會資本才能應對未來不可知的社會風險。

（本文作者為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教授、高齡跨域創新研究中心副主任）

關鍵詞：社會投資、福利國家模式、生命歷程、社會資本

參考文獻

- Wright, Erik Olin著，黃克先譯（2015）。真實烏托邦。新北市：群學。
- 吳明儒（2019）。〈以人為本的社會福利工程——臺灣高齡社會與跨域創新實踐〉。「中國人民大學第三屆社會政策前沿暑期講習班」，*Social Policy in the World*。2019/08/07。
- 吳明儒、劉宏鈺、歐紫彤（2018）。〈以共同生產觀點探析社區照顧整合體系之建立——以頂菜園社區為例〉，《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8（3）。頁123-160。
- 呂建德、葉崇揚（2017）。〈台灣所得分配惡化的政治經濟基礎：一個政治的解釋〉，許宗力主編（2017）。《追尋社會國——社會正義之理論與制度實踐》，頁625-672。臺北：台大出版中心。
- 李秉勤（2019）。〈社會投資型政策與發展〉。「中國人民大學第三屆社會政策前沿暑期講習班」，*Social Policy in the World*。2019/08/07。
- 林昭吟、劉宜君（2017）。〈社會投資觀點之政策理念與運用〉，《社區發展季刊》160。頁86-91。
- 牧野篤（2018）。《學習：改造「個體」為「關係態」的運動》（簡報檔）。嘉義：中正大學高齡跨域創新中心。
- 張英陣（2017）。〈社會經濟是社會福利的出路嗎？社會正義的反思〉，《社區發展季刊》160。頁28-35。
- 郭登聰（2017）。〈發展性社工作——在台灣推動的歷程、問題與建議〉，《社區發展季刊》160。頁111-124。
- 黃志隆（2014）。〈社會投資國家的青年轉銜與生命歷程政策：以瑞典和英國相關社會政策改革為例〉，《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8（2）。頁121-161。

- 黃源協（2010）。〈社區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關聯性之研究〉，《公共行政學報》34。頁29-75。
- 羅秀華（2011）。〈將社會發展融入社會工作〉，《社區發展季刊》138。頁251-262。
- Esping-Andersen, G., D. Gallie, A. Hemerijck, & J. Myles (2002). *Why We Need a New Welfare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merijck, A. (2017). Social Investment and Its Critics. in A. Hemerijck eds., *The Uses of Social Investment*. pp3-4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merijck, A.eds (2017). *The Uses of Social Inves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dson, J. & S. Kühner (2009) Towards productive welfar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23 OECD countries.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19(1), 34-46.
- Morel, N., B. Palier, & J. Palme (2015). *Towards a social investment welfare state?: Ideas, Policies and Challenges*. Bristol: Policy Press.
- Pestoff, V., T. Brandsen, B. Verschuere (2012) *New Public Governance, the Third Sector, and Co-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